

---

## 战时中苏关系史研究的新收获

——读《合作与冲突——1931—1945 年的中苏关系》

徐万民

---

1996 年出版的《合作与冲突——1931—1945 年的中苏关系》(以下简称《合作与冲突》),是李嘉谷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精心撰写的著作。该书收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抗日战争史丛书续编》,为丛书外交系列之一种。

广泛搜集与考订档案资料,依据档案资料写成论文与专著,是李嘉谷治学的特点之一。从《合作与冲突》一书可以看出,为了研究抗日战争时期的中苏关系,他研读过《美国外交文件》《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公布的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近代史研究所的藏档,大量私人记录,如回忆录、日记、书信、电报等。有如此坚实的基础,使《合作与冲突》一书史料丰富,言必有据,没有空洞无物的推论,读来令人信服。

《合作与冲突》立论实事求是,不囿于成说,避免简单化、概念化、分析细致而辩证,提供了许多既具启发性又富说服力的独到见解,深化了我们对战时中苏关系史的认识。

一、《合作与冲突》一书不是孤立地研究中苏关系。作者把战时中苏关系视为三四十年代全部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既然德日意法西斯对一切民族的独立、自由与民主构成巨大威胁,那么,全世界的反法西斯力量只有团结一致,才有可能战胜法西斯。从大西洋到太平洋,中苏两国辽阔的疆域连成一片。两国人口众多,可以动员庞大兵力。两国有丰富的资源且工业互补,经济与军事潜力雄厚。如果中苏两国始终团结一致,将会极大地增强世界反

法西斯阵营的力量。但是,由于亚洲和欧洲国际关系的影响,中苏两国的合作经历了曲折的道路。

在东亚,和战大局的决定因素是中日苏三国关系的走向。作者指出:“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就不仅利用了中国的贫弱,而且利用了中苏关系的恶化。”(第1页)九一八事变后,中苏两国于1932年12月12日恢复邦交。远东局势开始向有利于和平阵营的方向转化。但是,此后几年,日本使用种种外交谋略,阻止中苏接近。中苏互相猜忌,关于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停滞不前。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中国在国际上孤立无援的处境,悍然发动了以灭亡中国为目的的全面侵华战争。七七事变后,中苏两国终于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为苏联援华抗日奠定了基础。

影响中苏关系的还有欧洲因素。中国政府不满足于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一直力求同苏联进一步签订军事互助条约,多次敦促苏联出兵对日作战,但终于未能成功。作者在分析中苏互助条约交涉失败时,列举的第一条原因即是:“由于苏联国际环境的不利,东西两面受敌。”(第190页)德、意两国均反对中国联苏抗日。苏联倡议建立欧洲与亚洲的集体安全体系,共同制止德、日侵略。英法两国控制的国际联盟拒绝了苏联的正确主张。苏联怀疑英法挑动苏德战争,又怀疑中英美法挑动苏日战争。在欧洲大战爆发前,苏联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与英法反目为仇。中国政府在这种情况下,还希望促成中苏美英法在东方联合对日的局面,结果只能是一厢情愿。1941年4月,苏联在苏德关系日益紧张的形势下,为缓和苏日关系,鼓励日本南下,与日本签订中立条约,并停止对中国的武器援助,中苏关系进入冷却期。

1942年,美国为协调盟国关系和处理战后问题,实施了一整套对中苏关系影响深远的政策。从雅尔塔会议到中苏莫斯科谈判,美国的影响显著增强。对此,《合作与冲突》运用大量档案资料,进行了细致透彻地分析论证。

二、作者评判历史,遵循公认的国际法的一般准则,而不以两

国的意识形态如何论是非。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中苏关系史上,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交织,使众多的学者感到困惑莫解。作者在《合作与冲突》的前言中申明,“本书限于叙述中苏两国国家关系的历史。”(第4页)

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苏联政府一再声明:它的对外政策完全建立在自身利益的基础上,旨在减少敌人。今日为敌,明日亦可为友,凡对苏联友好的国家,均可同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后来,苏联违背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决议,与缔结《反共产国际协定》的德日两国先后握手言和。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均标榜反共,也没有妨碍苏联与他们建立良好的战时合作关系。可见,苏联在决定外交政策时,显然是将国家利益置于意识形态之上。

在中国,蒋介石长期坚持反共反苏的外交政策。九一八事变后,一变而为反共而不反苏,再变为联共联苏,执着地谋求缔结中苏互助条约,也是将国家利益置于意识形态的考虑之上。

以往,不少学者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衡量苏联的外交政策,指责苏联的援助不给延安给重庆。李嘉谷认为:“这种指责是离开抗战初期的历史实际的。”(第113页)抗日战争是中国全民族的解放战争,不是一党一派的战争。苏联将其援助给予国际承认的代表国家主权的中央政府,是符合中华民族的利益的。“试想,如果在抗战的前期,苏联硬要将一部分军火物资不通过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直接援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会有什么结果呢?这必然会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抗议,被指责为干涉中国的内政,使苏联在国际上处于不利地位。”(第113—114页)公开援助中共,会破坏中苏关系的大局,最终使中国失去苏联的一切援助。作者的结论是公正的。

一个主权国家的政府将维护本国利益视为衡量外交政策优劣的最终标准,是无可厚非的。习惯以意识形态论是非的人却要求苏联的援助是“无私”的。读过《合作与冲突》,人们就会知道,苏联援华

的动机是彻底利己的,而不是利他的。苏联严格掌握援华的时间、方式、武器的数量与规格,均是以最大限度地保障苏联的国家利益为前提的。作者认为避免东西两线作战关系到苏联的生死存亡,没有像有些学者那样,全盘否定苏日中立条约,只谴责苏联的损人利己行为。这种审视问题的角度,比单纯追究道义上的是非更为客观。

驱除日寇,光复国土,是中华民族自己的事。有外援,中国要抗战。没有外援,中国也要抗战。中国不能靠外国军队代替中国军队打日本。在亚洲,中国军队始终是对日作战的主力。战争后期,美军进入中国战区,是为了策应麦克阿瑟在西太平洋的反攻。在日本即将投降时,苏联出动 150 万大军参加对日战争,是为了收获雅尔塔协定许给它的权益,恢复日俄战争前俄国在远东的强国地位。众所周知,苏联出兵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的灭亡,但中国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566500 平方公里的外蒙古被割离;东北人民刚摆脱日本殖民统治的枷锁,又要面对苏军的经济掠夺和对中东铁路、大连、旅顺的控制。

《合作与冲突》的作者以大量确凿的历史事实为依据,揭露了苏联一系列侵犯中国主权,损害中国利益的行为:违背 1924 年《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向日本和伪满洲国出售中东铁路。与中国外蒙古订立君子协定和为期 10 年的互助议定书。在新疆地区干涉中国的内政。苏日中立条约签订时,与日本发表宣言,互相尊重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与“满洲国”的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公然破坏中国领土与主权的完整。与美、英两国签订秘密的雅尔塔协定,“严重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是苏联大国沙文主义与民族利己主义的表现,是国际强权政治的产物”(第 276 页)。在中苏莫斯科谈判时,斯大林恃强凌弱,威胁恫吓,强迫中国政府接受远远超出雅尔塔协定的苛刻条件。宋子文在长达两个半月的谈判中虽极力抵制,最后在百万苏军进入东北的严峻形势下,被迫接受了斯大林的条件。作者说:“无疑,1945 年 8 月 14 日签订的中苏条约侵犯了战

时的同盟国家中国的领土主权,是不平等的,是国际强权政治的表现。”(第 322 页)《雅尔塔协定》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使中华民族蒙受了极大的耻辱,严重伤害了中国人的民族感情,播下了中苏两国不和的种子。直到今天,我们还能感受到它的消极影响。

三、作者指出,中国对苏联的援助,也是其战胜德国的因素之一。多少年来,苏联学者的中苏关系史著作不厌其烦地炫耀斯大林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援助,绝口不提中国对苏联的援助。近十几年,一些中国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合作与冲突》用大量篇幅论述中国对苏物质、精神与外交援助的战略价值。苏联能战胜德国法西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成功地避免了东西两线作战。有人将其归因于苏联外交的高明与苏日中立条约。其实,仅靠一纸苏日中立条约既不能阻止日本进攻苏联,也不能阻止苏联进攻日本。日本战略家放弃北上选择南进的主要理由是:进攻苏联远东需要陆军,而日本陆军主力深陷在中国大陆战场。作者认为:“应该说,苏联战胜德国法西斯,不仅有美英国家的支援,也有中国的支持,因为中国同日本的战争,拖住了日本,使之不能发动对苏战争,间接支援了苏联的抗德战争。”(第 323 页)

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是不断发展的。苏联解体后,新披露的中苏关系史档案层出不穷,改变了我们对许多问题的现成结论。从这个意义上讲,《合作与冲突》一书,还有一些有待商榷的地方。

如作者说:“‘九一八’事变以前中苏两国关系恶化的主要责任自然在蒋介石的反苏反共政策。”(第 2 页)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论断。中国并没有损害苏联的利益,而是苏联政府出兵外蒙古,割裂中国领土,违背 1924 年中俄协定,把持中东铁路;为了维护其在中东铁路的不平等特权,不惜对中国发动战争。苏联应该承担中苏关系恶化的主要责任。

抗日战争前期,斯大林曾多次称赞中国军队的战绩。当抗战胜利在望时,斯大林在德黑兰、雅尔塔恶意诋毁,贬低中国军队,拒不

承认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和中国的大国地位。《合作与冲突》未论及这些严重影响战时中苏关系的事实,是不应该有的疏漏。

总之,《合作与冲突》的出版为从整体上把握战时中苏关系作出了贡献。我们有理由期待,在这部著作的带动下,会出现更好的成果,将战时中苏关系史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作者徐万民, 1943年生,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 刘兵)